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

伦理与秩序

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

干春松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梁漱溟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

伦理与秩序

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

于春松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 / 干春松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7123-6

I. ①伦… II. ①干… III. ①梁漱溟(1893-1988)—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2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633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

伦理与秩序

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

干春松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7123-6

2019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3/4

定价：38.00 元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成中英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成中英 干春松 任剑涛

唐士其 张允起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总序

梁任公九十多前在北京举办的演讲会上，提到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要采用新方法和新视角，期待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演进有所贡献，但此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很兴盛。相对于其他学科领域，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不多，能让大家记住的，也就是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少数几部著作。牟宗三先生到台湾后所写的《政道与治道》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部书有一个和同时代很多学者的著述相同的弊病，就是立足于西方的政治理论和伦理价值框架来谈中国，以中国古代有没有诸如自由民主等理念来做评判。其实这些概念的多数内涵，是近代欧洲和美国在特定历史情势下形成的，用它们来解释中国古代政治的缺失问题，当然偏差很大。至于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没有充分展开的原因，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家和政治学者的言说，还牵涉政治权力施行的实际过程，内容很广泛，比如古代的社会礼仪和民俗、不成文的习惯法、宗教戒律的影响，等等，过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对此很少有深入研究。

第二，政治思想的研究可以提炼出哲学成分，但哲学的理念不能等同于政治思想的全部，如果追溯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制度研究，就包含了很多今天人们意识里“政治思想”之外的内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伦理与政治问题分开讨论，后人就认为这两者可以割裂，研究政治思想也可以和研究伦理哲学或道德哲学一样，停留在概念辨析和规范讨论上。实际上，西方社会政治权力的历史发展相当复杂，仅从权力来源看，就产生过君权神授、契约论、演化论等不同学说，而这些学说都和欧洲自身历史发展相关，要了解它们的真正内涵，需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是单纯辨析几个理念就能做到的。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中国学者该如何总结、整理、重建自身的政治哲学思考？我认为需要回溯华夏政治结构及秩序的起源，重新叙述“族群生活—伦理宗法—政治国家”这样一个链条，显然这和欧洲的传统是很不相同的。为什么很多学者习惯于直接拿欧洲的政治发展路径来套用解释中国呢？这是因为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影响了人们的认知，也就是方法

论出了问题。目前，我们需要重新提出有解释力的框架，就要针对这些偏差提出一些问题，就此可以总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在中国历史起源语境下，如何理解政治权力的产生和发展？

其二，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权力的价值内涵及其规范性是如何表达的？

其三，在中国传统权力模型中，帝王与大臣、庶民的关系如何规范与调节？

其四，关于政治史、政治学的现代发展和现代性表达，在当代中国学术语境下如何实现？

其五，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在近现代的追求和运用，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与政治规范解释权转移的问题，出现了怎样的特殊变化？

其六，中西政治之间的不同，应该如何认知与解释，才不致脱离二者各自的本义太远？

其七，政治思想并非理念的简单投射，而是有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叠加缠绕，由此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做出批驳，该如何建立自身的新学说？

其八，政治与政治科学的关系，在当前中国该如何处理？罗尔斯把伦理价值再度引入政治讨论中，对韦伯以来政治理论研究的“价值中立”趋势是一个重要逆转，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该如何回应这一命题？

以上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几代学者的努力协作和学术积累，方能做出较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这套“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可以看作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开端与尝试，希望能给有关研究者和读者带来“以中国立场和全球视野思考中国政治思想”的启发。

最后，我在这里再谈个人的一些体会。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是否仅是为了发掘自己祖先的某些政治思想，表彰他们的独特价值？这样的工作似乎有很多人在做，比如从事中国文化传播的行业，可能还比我们做得更好。我认为政治思想研究者不宜做这样简单的跟风宣传。从对当前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几股思想潮流来看，社会主义以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为其理论基础，曾经兴盛的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基础，而保守主义则以文化中既存的价值倾向和制度习俗为基础，重视权力运用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这种实践来探索建立一种理想性的规范，使它和传统文明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这一点和中国古代贤哲的思考是相近的，接近于中国学者熟悉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前的世界并不太平，某些秉持单一理念的发达国家企图用武力将自己信奉的价值理念推广到全世界，在世界很多地区造成了人道悲剧，即使在其国内，也受到很多的质疑与批评。人类历史从文明草创到理性启蒙，再到现代性的发展，从西方近现代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一连串的霸权

兴起，东方则是一百多年来受到西方的压制，在强势话语冲击之下产生了思想变异，像日本就有了“脱亚入欧”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言说和实践。美国最初是一个松散孤立的邦联国家，后来联邦权力不断扩大，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十分集权而具有扩张欲望的世界性强权体系。人类从个体到小的氏族群体，发展到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再形成具有世界扩张能力的霸权体系，其间充满了矛盾冲突，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在现代化战争中被无辜杀戮，让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痛心疾首。我认为战争的根源是每个国家过分强调自身的利益和权力扩张，在争霸的过程中习惯了剥削弱小民族，甚至认为这种剥削理所当然。

现在的很多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应该扩大视野，从人类整体的视角来思考如何解决目前的政治矛盾与战争冲突，而不是延续以往那种“国家利益至上”的霸权思维。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如果对人类的合作与和平发展有所贡献，并引发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才能接近我们的根本目标。期待所有的有识之士，一起加入进来推动这项崇高的事业。

成中英

2018年12月于海淀西山庭院

目 录

引子 “国家建立不起来”：文化与秩序的错位·····	1
第一章 立宪与共和：清王朝的转型失败与民国的建立·····	11
第二章 “孔子的道路”：梁漱溟的“中西”和“古今”·····	31
第三章 乡村建设是一场建国运动·····	49
第一节 政治、经济的危机与乡村失败·····	51
第二节 从广州到河南村治学院·····	61
第三节 邹平的实验·····	67
第四节 理性早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 文化与社会互相塑造·····	83

第四章	制度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中生长出来：中国既不能走西方的路也不能走俄国的路	95
第五章	梁漱溟的路能走得通吗？	113
第六章	特殊性和普遍性：延安之行和抗日战争前后对中国政治出路的思考	120
第七章	“阶级”与“国家”：从《乡村建设理论》到《中国文化要义》	131
第一节	阶级与国家：中国原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	135
第二节	政党、国家与革命	147
第八章	梁漱溟的努力与反省——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我反思	158
第九章	人类创造力的伟大发现：新中国的建国之路	171
第十章	农民问题：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	183
第十一章	由身到心：梁漱溟的制度进化论	191

第十二章 理性之国：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土壤	206
第一节 社会主义缘何在中国取得成功	212
第二节 礼乐社会：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	224
余论：吾生有涯愿无尽	232
附录	235
一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235
二 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真儒气质	284

引子 “国家建立不起来”：文化与秩序的错位

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形态的文化或文明，关于文化或文明本身的问题更显复杂，以至于对其自身概念进行分析的过程就可以成为一门学问。所以，在此我只能大而化之地将文化区分为制度（包括成文的制度和礼俗，等等）、价值（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思维方式）部分，其中价值可以视为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与作为价值外化的制度，共同构成了文化系统。

许多学者对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进行过不同的概括，而其中影响较广的则是亨廷顿的文明区分论。他提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包括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①、

① 亨廷顿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同时我也认为，把日本归于儒家文化圈也有勉强之处。

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者还有非洲文明^①。普遍来说，用于分辨、界定文明之间区别的主要要素是宗教，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要素而言，宗教具有恒久的稳定性，并在塑造人类生活习惯和社会制度秩序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除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这类“普世宗教”之外，还有一些宗教形态具有更为特殊的独特性。比如，在中国，纵然宗教中国化的过程已经使外来宗教呈现出与原生地的变异性，但是人们依然接受并习惯于儒教文明的浸淫，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轻易地将儒家看作是一种“宗教”。

宗教的普世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提示我们：世界上的人生活在各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传统中，我们并不能将差异归因于地域或气候，至今人类也无法找到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理由来解释文化差异的原因。但是，当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之时，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彼此并非总是那么和平喜乐，大多数的时候则表现为“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招致了众多的非议和不满，或许人类未来能够具备避免文明冲突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经验为参照，在过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刻，文明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尤其在人类将生存的需求和信仰的决心结合得更为紧密的历史时刻，文明的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2页。

冲突就更为激烈。我曾经读过一本描述耶路撒冷的书，读起来很让人伤感，书里有一段话说：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另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①

的确，在面临冲突时，人类或许存在一万种避免冲突的方法，但在大多数时候，冲突仍然如宿命般不可避免地发生。这种宿命感甚至隐喻着和平是为了给冲突积聚力量、准备条件。但是，当人类理性觉醒时，则会意识到冲突肯定不是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也不是理解文明发展方向的唯一途径。在理性复苏的历史时刻中，来自儒教文明区域的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就激烈地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和谐共生的理念。

很显然，处于当今全球化中心的西方学者所讨论的文

①〔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页。

明的冲突终究会形成一种“西方”和“非西方”的思维方式，并将问题转化为“西方”的和“有待成为西方”的这样的“进步”和“落后”的问题。在这一思维方式的沿袭下，他们只能更多地看到冲突，进而通过将文化多样性问题实质性地转变为文化发展的落差问题，为他们的政治干预和经济侵略提供正当性的理据。

但是，如果我们从“非西方”视野来看待文化的差异，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观感。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社会危机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归结为文化危机的趋势。在发展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压力之下，近代许多知识分子会接受来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于“东方主义”的文化观念，并为了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在文化观上趋近于自我否定的态度。这一点已经由梁启超等人做了总结。即随着危机的加剧和应对乏力的加深，当时的中国人逐渐从器物层面的不足（洋务运动）上升到制度层面的不足（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最后到伦理和文化的“觉悟”。而伦理和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在 1840 年之后，中国近代文化观的变迁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而不断发展的。

梁漱溟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时候，正是伦理和文化大兴“觉悟”的时代。他最初为人所知，就是因其在文化观念上与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从而将中国

的文化保守主义引入了新的阶段。

在思考问题的轨迹上，梁漱溟的保守主义倾向延续了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前行者的思想脉络。

其实，当李鸿章等人将其所面对的西方冲击描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他心目中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即“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如果说中西问题主要讨论的是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差异的话，那么古今问题就是要面对中西是否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问题。这两个维度被梁漱溟形象地概括为“不同”和“不及”。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最后的《人心与人生》等作品，梁漱溟一生都在处理“不同”和“不及”。他始终要强调的是“不同”而不是“不及”，但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其立场的“漂移”。

而这一问题，在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里，被表述为“西学中源”或“中体西用”，这些充满着文化的理智和情感冲突的复杂性思考，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描述为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滚滚车轮”。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既充满着一种对于未知世界的犹豫，又透露着一种立志变革的决心。对于李鸿章这样的外交家来说，尽管他并不可能完全清楚产生如此之大变局的原因来自哪里，但是，他已经开始了解，